

京师学术随笔



思想的长河

文化与人生

杨国荣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師學術隨筆



思想的长河

文化与人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长河：文化与人生 / 杨国荣著.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

(京师学术随笔)

ISBN 978-7-303-15798-3

I. ①思… II. ①杨…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2416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SIXIANG DE CHANGHE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5 mm
印 张：22
字 数：289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策划编辑：饶 涛 责任编辑：贾 静
美术编辑：毛 佳 装帧设计：耿中虎
责任校对：李 茵 责任印制：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目 录

文化与人

- 冯契与智慧说 /3
- 缅怀罗蒂 /10
- 胡适其人 /16
- 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性 /30
- 全球正义：意义与限度 /34
- 城市精神与人 /40
- “上海人”的文化印记 /49
- 哈佛一瞥 /55
- 知识分子的多重面向 /58

价值与德性

- 人生之境 /71
- 意义与人的存在 /79
- 寻找自我 /88
- 自我与个体性原则 /92

个体与个人 /96
价值原则与意义世界 /101
游子伦理 /111
感恩：走向人性的深处 /115
和而不同 /118
心性之学与德性伦理 /125

知识与智慧

“道理”与“讲道理” /131
日常存在与终极关怀中的“真” /143
认识与存在 /155
能知与“整个的人” /160
形上智慧的探求 /167
熊十力与本体论哲学 /171
牟宗三与道德的形而上学 /176
天人之际 /180
探索真实存在 /186
中国文化中的“道” /192

反思学术

学无中西 /209
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212
学科意识与跨学科的视域 /217
人文学科的建设与学术发展的规律 /224
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 /227
回到经典 /233

走近哲学

什么是哲学 /241

何为中国哲学 /255

中西之学与世界哲学 /266

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 /278

对话与沟通：中国哲学的当代处境 /293

认同与承认 /300

哲学何为 /306

成己与成物 /318

学术自述 /333

后 记 /345



文化与人

冯契与智慧说^①

20 世纪的下半叶，中国的哲学界虽然并不沉寂，但却很少有真正自成一系的哲学家。然而，在这个世纪即将终结之际，冯契先生（1915—1995）却以其深沉的思辨和吞吐百家的气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独树一帜。与历史上一切真正的哲人一样，冯契先生毕生从事的，是智慧的探索。直到其生命的最后日子，他依然没有中断哲学的思考。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先生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切入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对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为中国当代哲学留下了一个创造性的体系。

① 冯契先生是我的导师，1995 年 3 月先生与世长辞，当时我远在英国牛津，未能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冯契先生原名冯宝麟，191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早年在杭州读中学，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抗战爆发后，曾赴延安，并辗转山西、河北等地，参加抗日工作。1939年前往西南联大复学，1941年毕业于。1941年至1944年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从学于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等。离开西南联大后，曾任教于云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并在《哲学评论》、《时与文》、《展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与杂文。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并先后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等，主编《哲学大词典》、《中国近代哲学史》；其个人的哲学思考成果，主要体现于10卷本的《冯契文集》中。

以智慧的探索为中心，冯契先生的哲学思考涉及中国哲学史、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各个领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是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一卷本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如书名所示，冯契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考察，侧重于揭示中国古代哲学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及科学的比较方法，冯契先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演进的历史脉络及其中的逻辑环节，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特点作了深入的分析。冯契先生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包括如下四个问题：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或者说，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宇宙发展法则）？第四，人能否获得自由，或者说，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在冯契先生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在关注前两个问题的同时，又对后两个问题作了更多的考察：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天人之辩；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名实之辩，二者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上，显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就名实之辩而言，冯契先生认为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较早地发展了辩证逻辑；每当中国达到总结阶段时，就有哲学家或逻辑学家对辩证思维的形式进行考察，提出辩证逻辑的原理，在先秦哲学的总结阶段，《荀子》、《易传》、《内经》初步形成辩证逻辑的系统，到宋明，从沈括、张载到王夫之、黄宗羲，辩证逻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冯契先生进而指出，与辩证逻辑的早期发展相应，中国较早地发展了辩证法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以气一元论为基础，将“道”理解为阴阳的对立统一。辩证逻辑与辩证的自然观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作了肯定的回答和多方面的考察。冯契先生的这一看法不同于所谓中国人“重人生轻自然、长于伦理而忽视逻辑”的流行之论，它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对中国传统认识论和自然观的理解。

在人的自由问题上，冯契先生认为，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更多地考察了自觉的原则，而对自愿原则则有所忽视，后者容易导向宿命论。冯契先生对正统儒学的宿命论倾向作了深入地分析。按冯契先生的看法，自由不仅是伦理学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美学。在美学上，冯契先生指出：西方人比较早地提出了美学上的模仿说（再现说）和典型性格理论，而中国人则比较早地发展了美学上的言志说（表现说）和意境理论。这些看法基于对中国哲学的长期沉思，将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有见于其剧烈变革的社会历史前提，冯契先生研究的侧重之点主要在于其“革命进程”。按照冯契先生的看法，中国近代哲学以“古今中西”之争为其背景，具体围绕着如下四个问题展开，即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人的自由和理想。这些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理气（道器）之辩、心物知行之辩、名实之辩、天人之辩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又受到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随着进化论的输入，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开始拉开帷幕，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

主义的传入，则使哲学革命由进化论阶段发展到唯物辩证法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历史观与认识论的论争逐渐结合起来，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主线，最后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作了总结；逻辑与方法论及人的自由和理想的论争，在中国近代未能作出系统总结，冯契先生由此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哲学革命”的问题。这些考察，既清晰地梳理中国近代哲学演进的脉络，又将近代哲学的变迁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联系起来，使历史的考察成为哲学重建的起点。

哲学史与哲学的统一，是体现于冯契先生哲学研究过程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以往哲学的考察，总是处处渗入他的哲学见解，而他的哲学思考，又伴随着对以往哲学智慧的总结。这种总结，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智慧说三篇》中。《智慧说三篇》由三部相互联系的著作构成，这三部著作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早在青年时代，冯契先生便“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个哲学问题非要解决不可”，这个问题就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如前所述，冯契先生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不应限于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而且应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这里既涉及具体经验领域的知识，又涉及性与天道的智慧，元学与知识论统一于广义的认识论。

按冯契先生的理解，广义的认识过程包括两个飞跃，即从无知到知的飞跃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由无知到知的过程发端于实践中获得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冯契先生认为知识经验领域无非是以得自经验者还治经验，得自经验者即是概念，用概念来摹写和规范经验，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由此形成了知识经验。作为知识经验主体的“我”，运用逻辑范畴进行思维，运用归纳与演绎相统一的接受总则统率经验领域。形式逻辑与接受总则即构成了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

之所以可能的条件。

经验知识涉及的是名言之域，在冯契先生看来，认识并不限于经验领域，它同时指向性与天道，后者即是智慧之域。如果说认识论的前两个问题主要关联着经验知识，那么，智慧则更多地涉及认识论的后两个问题。就具体真理而言，其最高的形态可以归结为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和发展原理，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即是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而关于道的真理性认识又内在地关联着人的发展，后者便展开为自由的人格。冯契先生肯定，逻辑思维能够把握具体真理：人能够在有限中认识无限，在相对中揭示绝对，而这一过程即表现为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就对象而言，通过如上飞跃，自在之物不断化为为我之物；就主体而言，精神由自在而自为，自然赋予的天性逐渐发展为自由的德性，从而达到理想的人格。

知识所注重的是有分别的领域，它可以用名言来把握。就表达而言，知识是由命题（包括特殊命题与普遍命题）分别地加以断定（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并以语句分别地加以陈述；就所表达（所知）而言，则是把对象区分为一件件的事实、一条条的定理，以把握事实和条理之间的联系，知识经验的领域即是以名言概念来区分的世界，无论是特殊命题，还是普遍命题，其真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冯契先生认为，与知识不同，智慧所把握的是有关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它的目标是求穷通，亦即穷究宇宙万物的第一因和人生的最高境界，揭示贯穿于自然与人生之中无不通、无不由的道，并进而会通天人，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自由境界。总之，智慧追求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东西，“这就是难以言传的超名言之域了”，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便相应地意味着从名言之域走向超名言之域。

如何实现从名言之域的知识到超名言之域的智慧？冯契先生从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德性自证诸方面作了考察。转识成智的飞跃，旨在领

悟有限中的无限，相对中的绝对，这种领悟往往是在顿然之间实现的，它表现为哲学上的理性直觉。理性直觉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它通过破而超越对待，通过立而揭示相对之中的绝对，由此达到天人、主客、能所的统一，而这一过程本身又实现于认识的无限的前进运动中。通过理性直觉达到的领悟，必须以辩证的综合来论证和表达。冯契先生区分了总名与达名，达名表示的是最高的类，总名所表示的是元学的理念，亦即大写的 Idea，总名可以看作是达名的辩证综合，如时空范畴便是达名，当我们说在有限中揭示无限、在瞬间把握永恒时，便是以时空范畴作辩证的综合，以表述超名言之域。与辩证综合相联系的是德性的自证。理性直觉与辩证综合的主体是我，我不仅有意识，而且能自证其德性，亦即对自己的德性作反思和验证，在言行一致的活动中自证其德性的真诚与坚定。

可以看到，从无知到知、又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既是知识论的问题，又是元学或本体论的问题；以广义的认识论为基础，冯契先生对知识论与本体论作了沟通，并由此展示了统一本体与现象、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的独特思路。

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作为性与天道的理论，属于超名言之域。理论不能仅仅停留于形而上的层面，智慧学说在超越名言之域的同时，又要始终保持与知识经验和具体人生的联系。冯契先生以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概述了以上关系。化理论为方法，主要说明认识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在《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中，冯契先生运用客观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相统一的观点，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类、故、理等范畴，建立了一个辩证逻辑的范畴体系。化理论为德性，则是指将认识的辩证法贯彻于价值领域，在实现真、善、美理想的过程中，培养自由的人格，在《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中，冯契先生对此作了深入的论述。这样，主体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

中转识成智，又通过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而不断地向知识经验与现实人生回归，知识与智慧、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展开为一个基于广义认识论的动态统一过程。

哲学自其诞生之时起，便与智慧结下了不解之缘。冯契先生以智慧说上接哲学的源头，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吸取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思维成果，他的理论，既可以看作是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总结，又表现为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回应。作为一种开放的体系，冯契先生的智慧说当然并没有终结中国哲学，但它无疑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缅怀罗蒂

2006年9月，应罗蒂的邀请，我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前往斯坦福。然而，未曾预料的是，2007年6月8日，罗蒂却溘然长逝。就在他去世前一周，我还与他联系，虽然他的夫人说其健康状况变得很糟，但我仍没有想到他会走得如此之快。当时得知此讯，我既感震愕，也深为悲痛。

我第一次知道罗蒂之名，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尚在读研究生，其间曾从书店买到一本《哲学与自然之镜》的中文译本，但读后似乎也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在各种哲学、文化的书刊中，罗蒂的名字一再被提及，其名声在国内学界也越来越大。但我对其后来的著作并没有特别关注，在朦胧的印象中，他好像主要表现为哲学传统的批评者，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再后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东渐，罗蒂每每又被归属于广义的后现代思潮之

列，所谓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等流行之论，往往都会上溯到罗蒂，我对这一类的笼统套语一直不以为然，罗蒂与这些趋向的联系，使我对他也产生了某种疏远感。

2004年7月，罗蒂访华。其间，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一次“罗蒂与中国哲学”的学术讨论会。为准备会议的发言，我浏览了罗蒂的若干著作，对罗蒂思想的印象，也开始有所改变。尽管对他所说的，我仍并不都赞同，但在阅读中我感到，他的思考不同于浮泛轻浅的哲学“前卫”或“先锋”，其中有严肃的关切，也有深刻的洞见。他对偶然性、社会凝聚、社会希望等的考察和思索，既体现了学者的责任，也展示了哲人的睿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此次会议，我有机会与他直接会面和交谈。记得他当时下榻于上海和平饭店，这是一个有较长历史的宾馆，位于外滩，面临黄浦江。初次见面，我的感觉是他有些内向甚至腼腆，不甚健谈，很少主动提出话题，这与他在哲学论著中所表现出来的锋芒和锐气，似乎形成了很强的反差。

我在提交会议的发言提纲中谈道：“在认识论上，与传统的实用主义相近，罗蒂首先强调知识的意义在于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表征现实。从理论上说，解决问题首先涉及的是评价，而就评价的角度而言，知识的意义便主要在于它是否能够对于相关问题提出好的或者有效的解决方案。与此相对，表征现实则指向了认知：它的任务是描述或者敞开对象和客体。换言之，评价往往涉及知道如何（knowing how）或知道如何做（knowing how to do），而认知则关联着知道什么（knowing what）或知道某物是什么（knowing what the thing is）。罗蒂追随传统的实用主义，似乎赋予评价以更多的优先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而以评价取代了认知或将认知融合于评价。在此种观点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他倾向于强调善或者价值，而或多或少忽略了真。事实上，对罗蒂而言，一个命题或者信念（belief）的真假主要取决于它在广义的社会实践领域里是否有用或者成功，在这一点上，罗蒂同样上承了传统的实用主义。”